

# 《晚清文选》与郑振铎眼中的“晚清”

郭道平\*

- 一、《晚清文选》的编选渊源
- 二、《晚清文选》：郑振铎眼中的“晚清”

## 〈국문초록〉

1937년 7월, 上海生活書店에서는 정진탁(鄭振鐸)이 主編한 《晚清文選》을 출간하였는데, 이 작품집은 중화민국 시대에 “晚清時期”로 기획된 첫번째 斷代文學總集이다. 1930년대 중반 중국문화계의 文學話頭와 選本氣風의 興盛局面은 鄭振鐸의 “文選” 編輯意識에 결정적인 영향을 주었고, 阿英과의 교류는 鄭振鐸으로 하여금 “晚清”에 대한 흥미를 불러 일으켰으며, “世界文庫”의 발행은《晚清文選》의 탄생에 직접적인 계기를 제공하였다.

《晚清文選》의 간행은 晚清文學의 文獻을 중시해야 한다는 자각의식에서 출발하였으니, 鄭振鐸은 晚清文學研究에 일생을 바친 阿英과 더불어 만청문학연구의 개척자라는 평가를 받아 마땅하다. 《晚清文選》의 選文 취지는 현실 사회에 대한 관심과 문제의식을 구현하였으며, 《經世文編》의 氣質을 계승하면서 동시에 新文學의 興趣도 흡수하였다. 鄭振鐸이 《晚清文選》에서 보여준 “晚清”이란 시기는 시대에 대한 총체적인 평가이고, 또한 1930년대의 時局에 대한 대응이기도 하다. 그리고 “晚清”의 時間範疇와 時代性에 대한 鄭振鐸의 기술은 현재 시점에서 보아도 상당히 精密하고 明確한 것이다.

---

\* 中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핵심어 : 《晚清文選》 鄭振鐸, 阿英, “晚清”, “世界文庫”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郑振铎, 历来主要以小说、戏曲以及版画研究等领域的成就为人瞩目 ; 然而其于1937年出版的《晚清文选》一书, 作为民国间首部以“晚清”命名的断代文章总集, 在晚清文学研究的发轫阶段, 其意义尚有可待阐发的空间。本文试图在1930年代中期的时代背景之下, 考察该书的编选渊源和选本特点, 以及其中所体现的郑振铎的“晚清”观念。

## 一、《晚清文选》的编选渊源

1930年代中期, 郑振铎正进入个人学术研究的成熟阶段和高峰期, 其学术重心明显集中于中国古典戏曲和小说的研究, 同时也进行文学创作。其于1934年写作的历史小说《黄公俊之最后》, 以太平天国史事为背景, 业已显出对于“乱世”和晚近时代的兴趣; 稍后《晚清文选》的编选, 由其学术轨迹来看, 乃是在时代风习的作用使然下, 于偶然机缘中仍寓示着历史的趋向。具体而言, 可从以下三方面予以考量。

其一, “文学史”的时代与“选本”的盛兴。自20世纪初黄人、林传甲编著《中国文学史》, 掀开国人自著文学史的序幕以来, 从整体性的文学史以至各文体、断代类史著层出不穷; 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称之为“文学史的世纪”, 恐亦不为过。1930年代尤其是文学史写作的热潮时期, 这与1920年代以后、新式学者将传统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亦密切相关。将“科学”的质素引入人文学研究, 首先突出地体现为历史的和系

统的研究方式，“文学史”遂成为研究者心目中的最高范式。风潮所至，概莫能外：不仅钱基博将其未脱传统笔记风格的著述名之为“文学史”，鲁迅晚年也表达过对于文学史著述的自我期待。而在工业化尚在酝酿、社会科学仍在崛起中的二三十年代，文学话语在公共知识领域中正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从杂志出版和书籍刊印的盛况即可见一斑。作为成长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典型“文学青年”，文学史研究是郑振铎一生职志，“毕生精力所在”<sup>1)</sup>。早在1920年代初时，郑振铎即向学界“要求一部‘中国文学史’”<sup>2)</sup>；1930年代，他的兴趣和研究重心已从外国文学转向本国文学。而无论从书刊编辑抑或文学研究方面，郑振铎都是此时文坛的重要人物之一。

尚需指出的是，193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选本”的风气亦盛兴一时。作品选的存在实亦出自文学史讲授和研究的需求，二者理应相辅而行。郑振铎即曾明确表示，系统地印行名著原本，亦是为了补充文学史难以实现的提供作品全文的缺憾。<sup>3)</sup> 1933年冬，有感于当时的文坛动向、以及青年是否应阅读《文选》等传统典籍引起的争议，鲁迅撰写了《选本》一文，次年初发表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鲁迅提出，选本的影响，力量“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提请“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留意”。此文既不妨是对于1932年《近代散文抄》的出版和流行以及周作人序言中选文议论的呼应，也可视为稍后“选本”盛兴的发端之音，相关讨论随之兴起<sup>4)</sup>。也正是在1934年，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编辑赵家璧

---

1) 周子同：《汤铸篇·序》，《郑振铎全集》第三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73页。

2) 《我的一个要求》，《郑振铎全集》第六卷，第56页。

3) 《世界文库发刊缘起》，《文学》1935年第5期。

4) 如密切了解文坛动向的阿英即在1934年中接连发表《论文选》和《“选本”》二文，讨论选文的不易(见《夜航集》，《阿英全集》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7页)。

开始主持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从新文学运动史与文学作品选本的双重面向上呼应潮流，成就了此一“选本”时代的巅峰之作。

郑振铎深度参与了这一过程。《文学季刊》在北平创刊，郑振铎是两位主编之一，且此时与鲁迅来往颇为频密；《选本》一文的发表，或即是出自郑的邀约<sup>5)</sup>。而赵家璧组织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郑振铎亦予以重要协助<sup>6)</sup>，不仅帮助联系胡适、周作人、朱自清等编选者，且承担了其中《文学论争集》的编纂工作。1935年夏，郑振铎返沪定居，10月为《文学论争集》写成《导言》；一年后即发表《选文小记》，言及《晚清文选》业已葢事；可以推想，郑振铎应是在完成《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后不久，即开始了《晚清文选》的编选工作，主要应于1936年中进行。《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经验无疑为《晚清文选》提供了启示和参照。

选本的编辑实际上也暗合了郑振铎对于文学文献的兴趣和自家研究取向。中国文学史上的选本传统源远流长，1933年引起鲁迅谈论该话题的《文选》堪称典范之外，如郑振铎回忆，中学时即曾藉《古今文综》自行辑钞成“论文辑要”。<sup>7)</sup>郑本来“性喜聚书”，<sup>8)</sup>自然偏向于文献之学；其于1934年中发表《一九三三年的古籍发见》和《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主要注目于戏曲和小说文献；《晚清文选》的编辑，将郑振铎对文学史料的注意力从文类上拓展到了文章的领域。

其二，与阿英的交往，兴起对“晚清”时代的兴趣。如果说“选本”观念的盛行和《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从“文选”的体例上为郑振铎

5) 参见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上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16页。本文所述郑振铎生平实及相关资料，如无说明，均系根据此书。

6) 参见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上册)，第563等页。

7) 见《中国文学研究·序》，《郑振铎全集》第四卷，第1页。

8) 《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跋》，引自黄裳《榆下说书》，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7页。

提供了启示，那么与阿英的交往则很可能提示了郑振铎对于“晚清”的关注。

郑振铎与阿英同为“五四”一代青年，在身世、经历以至文学和学术趣味上不无相似；二人同在上海文化界活动，亦早有相识。<sup>9)</sup> 1930年代中期《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似乎令两人的交往频繁起来。阿英丰富的资料收藏为“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者提供了重要帮助，郑振铎亦是其中之一。在《文学论争集·导言》的末尾，郑振铎特地声明：“最后该谢谢阿英先生，本集里有许多材料都是他供给我的。没有他的帮助，这一集也许要编不成。”<sup>10)</sup> 这一资料上的倚助在随后《晚清文选》的编纂过程中得以继续。

阿英对于晚清小说的研究自1930年代前期开始，且为郑振铎所知晓。1935年5月21日，郑振铎致信商务总经理王云五，为出版《晚清小说史》事，特意介绍阿英与王云五相识：

友人阿英先生数年来搜求晚清小说，用力至劬，研究至邃，作为《晚清小说史》一书。现先成晚清两大小说家，一为吴趼人，一为李伯元。此二人皆为近人所注意的目标，将来出书，必可风行。特介绍阿英先生和先生面谈一切。<sup>11)</sup>

1933年9月18日，阿英曾写作〈读《庚子外纪》〉一文，批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行径，发表在《生存月刊》上<sup>12)</sup>；此文或许是阿英在报刊上

---

9) 钱小惠、钱厚祥撰《阿英年谱》将阿英和郑振铎订交系于1928年(《阿英全集·附卷》，第410页)。本文中有关阿英生平事迹的叙述，如无注明，均系据此年谱。

10) 《郑振铎全集》第三卷，第543页。

11) 引自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上)，第596页。

12) 见《生存月刊》1933年第四卷第7期；在该刊前一期(第四卷第6期)，阿英发表了《反帝国主义文艺述评》，其中一节为“赛金花”。

发表的最早有关晚清的专门论述。尽管所论并非小说，文章意旨也在于中外时势而非晚清研究，然而可以推知，阿英此时已在阅读晚清史料，并应是其晚清研究的起始阶段。<sup>13)</sup> 阿英关注“晚清”而首先从小说入手，除晚清小说杂志确乎引人瞩目外，还应有一重直接的渊源，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

1930年代初，阿英对鲁迅的看法已经转变<sup>14)</sup>，并有直接的交往；鲁迅此时在文学界的地位亦足以影响一时。小说研究是当时文学研究的显学；1920年代鲁迅出版《中国小说史略》，末篇即以“清末之谴责小说”作结。阿英研究晚清小说，先成吴趼人和李伯元二节，正是《中国小说史略》中首先表彰的人物；1935年发表的《小说琐记》<sup>15)</sup>中〈胡宝玉〉一节，即引用《中国小说史略》；稍后《晚清小说史》中所引证的先行研究，亦主要是《中国小说史略》以及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鲁迅以“清末”相指称，而阿英终使用“晚清”概念，若加以细究，其远源或竟与周作人发生关联。周作人自1920年代即倡导小品散文；1932年，沈启无在北平出版晚明清初小品选本《近代散文抄》，将周作人数年前“编出一本文选”的想法付诸实践<sup>16)</sup>，周为之两番作序，在文坛掀起一

13) 阿英曾自述：“一九三二年冬，因为要编《现代中国文学史》，从离开了多年的故乡，把所藏的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书报杂志，全都带到了上海。”（《中国新文坛秘录·前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阿英于1933年5月写成此篇《前记》，与其在《生存月刊》发表《反帝国主义文艺述评》、《读〈庚子外纪〉》二文时间相近；可以推想，其从故乡带到上海的书报杂志中，很可能也包括了晚清的报刊书籍，其对于晚清史料的着意阅读和研究，应从此时开始。尽管起初阿英的注意力尚在于新文学运动，然而“晚清”应迅速引起了阿英的兴趣。

14) 1931年3月，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钱谦吾编《转变中的鲁迅》，收录鲁迅作品及他人评论文章二十余篇；编者在序言中肯定了鲁迅立场向“普罗群众”的“转变”。“钱谦吾”系阿英笔名。中国国家图书馆尚收录1931年北平东方书店出版的《转变后的鲁迅》一书缩微胶片，所收文章相同，署黎炎光编。可以推测，“黎炎光”系阿英的另一笔名。

15) 《太白》1935年第二卷第5期。

股晚明小品热，从出版界的动向即可见一斑<sup>17)</sup>。阿英也参与了这一风潮：1934年，他编印了《晚明十八家小品》<sup>18)</sup>；两年后又出版《晚明小品文库》。风气所之，1934年，郑振铎亦曾辑印“明季史料丛书”。晚明小品散文的选辑风气亦应影响于郑振铎的选文观念；而对“晚明”的关注，未始不曾从字面意义上启发阿英关于“晚清”概念的使用。

1930年代中，阿英在上海大量编印和撰写新文学、晚明以及晚清文学的资料和论著，亦与其以文谋生的生计需求有关。其时学院与市场、研究与创作之间壁垒并未分明，沪上报刊业和出版界的繁荣为研究者提供了相当便利。阿英自1933年投入晚清研究，二三年后业已累积一批成果。1935年6月10日，他在给中华书局编辑舒新城的信中说道：

此书(引者按：指《李伯元》)将来销路，以英观之，不会冷落。因晚清文学，经英今年在各报纸、杂志发动后，颇已引起注意，良友《新小说》下月且出专号提倡，如即能付印，定能销一批也。<sup>19)</sup>

所谓良友《新小说》，系指郑伯奇主持、1935年创刊之《新小说》；该刊第一卷第5期上，阿英以“寒峰”为笔名发表《文明小史》，是为对李伯元该小说的长篇研究文章，作为该刊的“名著研究”系列刊出；此后《新小说》改版，对于晚清小说的研究更见重视，第二卷第1期上，不

---

16) 见周作人致俞平伯信，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17) 参见黄开发《一个晚明小品选本与一次文学思潮》(《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18) 1934年末，阿英尚编成《现代十六家小品》，将周作人列为首卷，且首先选入周为沈启无《近代散文抄》原稿所作的第一篇序《冰雪小品选序》(见《现代十六家小品》，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本1990年版)；次卷“俞平伯小品”又选入《〈近代散文抄〉跋》；可证阿英对于周作人及《近代散文抄》一脉的认同之意及思想关联。

19) 《阿英全集》第四卷，第543页。

仅刊登了赵景深《〈老残游记〉及其二集》、郑君平《悼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先生》二文，且宣布该刊第二卷第2期为“晚清文学研究特辑”<sup>20)</sup>，此即应是阿英信中所说的“下月且出”之“专号”。可以想见，《新小说》之关注“晚清”，与阿英有着直接的关联；该刊从刊名上即向晚清同名小说杂志致敬，改版后所设想的专号，亦有作为晚清文学研究专门阵地的自觉用意。惜在出版第二卷第1期后即停刊，“晚清文学研究特辑”未能如期面世。

尽管如此，1935年仍堪称晚清文学研究的正式开端年份。《新小说》杂志所设想的“晚清文学研究特辑”即为标识之一。与此相应，阿英自言于1935年在“各报纸、杂志发动”有关晚清文学的研究，“颇已引起注意”，已是在有意识地推动此一事业，且确曾取得不菲成绩<sup>21)</sup>。而郑振铎则是

20) 《新小说》1935年第二卷第1期，第71页。该“特辑”的作者，“由郑振铎、阿英等执笔”(赵家璧：《回忆郑伯奇同志在“良友”》，见王延晔、王利编《郑伯奇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此外，郑伯奇在《悼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先生》(《新小说》1935年第二卷第1期，第71页)中提及，曾请曾虚白写一篇“关于《孽海花》及其作者的文章”在第2期发表；另赵景深的《老残游记及其二集》一文，原亦拟在第2期刊出(见《编辑后记》，《新小说》1935年第二卷第1期，第91页)；可以想见晚清小说研究是该专辑的重要内容。

21) 1935年，阿英校序的《庚子国变弹词》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亦是《新小说》社主其事(见阿英为该书所作序言)。此外，根据对民国期刊数据库和大成老旧刊数据库、《申报》数据库的检索，阿英所言1935年中对于晚清文学研究的“发动”，除《〈文明小史〉》外，还应包括《庚子事变在小说上的反映》(《文学》1935年第五卷第2期)、《小说琐记》(《太白》第二卷第5期)、《惜秋生非李伯元化名考》(《太白》第二卷第8期)、《清末文艺杂志》(《太白》第二卷第10期)、《冷眼观》(署“阿英”，《文史春秋》1935年第4期)、《上海游踪录》(《人间世》1935年第32期)、《关于秋瑾的一部小说〈六月霜〉》(《人间世》1935年第27期)、《太平天国三字经》(《真光杂志》1935年第三十五卷第2期)、《中国维新运动时期的一部鬼话小说》(《文艺画报》1935年第一卷第4期，该文版面上同时刊出了《孽海花》剧本和小说的介绍图像，当与阿英的推介有关)，以及《〈诗发缘〉》(《文史春秋》1935年第3期)、《弹词小说论》(《申报》1935年3月25日)、《吴趸人的小说论》(《申报》1935年6月26日)、《小说从话论略(一)》(《申报》1935年6月28日)、《小说从话论略(二)》(《申报》1935年7月1日)、《清末的商人小说》(《申报》1935年7月24日)、《太平天国三字经》(《申报》1935年9月19日)、《陵汴卖书



“引起注意”者中的重要一位。其于1935年帮助阿英联系《晚清小说史》的出版，对于阿英的晚清小说研究评价甚高。此前郑振铎主要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1935年之后对于“晚清”的关注，应来自阿英的启发，并曾跻身于拟想中的“晚清文学研究特辑”作者之列。在《晚清文选》的序言里中，郑振铎说：

阿英先生和吴文祺先生的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阿英先生收藏晚清的作品最多。很难得的《民报》全份、《国闻报汇编》、《黄帝魂》等等，都是从他家里搬来的。<sup>22)</sup>

吴文祺是郑振铎在暨南大学的同事，受郑之邀，此时也参与“世界文库”的编辑工作；吴很可能在整理、标点等方面对于《晚清文选》的编纂有所协助。《晚清小说史》和《晚清文选》于1937年5月、7月相继由商务印书馆和生活书店出版，堪称其时晚清文学研究双璧。而郑振铎以“文选”的方式，将对“晚清”的关注由小说拓展到文章，丰富了其时晚清研究的话语空间。

其三，“世界文库”的发行，提供了具体契机。1930年代文学选本的盛行，在主题上涵盖了新文学、传统文学和世界文学；在体例上则突出体现为大型丛书的设计和出版。作为出版家的郑振铎亦未尝自外。1935年1月，

---

记》(《申报》1935年10月18日)等；此外，《海上买书记》(《青年界》1935年第八卷第5期)中也有关于求购李伯元著作的生动描述。从文章标题中“清末”、“中国维新运动时期”的使用来看，阿英初时并未专以“晚清”来指称此一时期；至1935年5、6月间，郑振铎、阿英使用“晚清”概念已十分熟稔，且“晚清小说史”亦已定名。尚可一提的是，1935年5月起，阿英在《太白》杂志接连发表文章，郑振铎亦正于此时致信王云五推荐阿英《晚清小说史》；郑振铎为《太白》杂志的编委之一，可以推想，阿英此时在《太白》杂志以及《文学》上刊发的数篇晚清研究文章，可能即是出于和郑振铎的联系。

22) 《晚清文选·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正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筹编期间，郑振铎提出了编行“世界文库”的设想。时人评论此乃受到1934年“文学遗产”讨论影响的结果<sup>23)</sup>，然而在郑振铎对于古典文学的兴趣之外，其时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热潮与郑振铎自身的世界文学素养，以及出版界选本、丛书体式的流行，同样是不可忽略的时代要素。“世界文库”的发行，为《晚清文选》的诞生提供了具体的契机。

1935年5月1日，郑振铎参与主持的《文学》月刊刊载了《世界文库发刊缘起》、《世界文库编例》及《世界文库第一集目录》，表示要对世界文学名著进行“有计划的”翻译和整理，范围从古典时代以下直至于近代，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名著，文体上则是诸体兼备；这一设想规模宏大，仅第一集就计划花五六年时间，囊括二百种以上的“第一流的作品”；而“整理”中国古典名著的要求，除传统的校勘方式外，注重加以新式的标点；并拟采用定期刊物的形式，每月一册，“约四十万字”，中国、外国者“各占其半”(《世界文库编例》)。“世界文库”定位于大众读者，强调价廉质优，同时借助《文学》等杂志多次刊登整页广告宣传造势，乃是学术普及和商业运作的大手笔结合。该文库借助郑振铎的组织和影响力，动员了多位文坛和学界名流参与，发刊时颇引起反响。然而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大时代里”，这一“弘巨”(《世界文库编例》)的工作终究未能如期实现：文库至1936年4月20日出版至第12期时中辍；后又出单行本十余种<sup>24)</sup>，《晚清文选》即是其中之一。

“世界文库”中辍的原因，或亦在于其内容和体例上的现实困难<sup>25)</sup>。

23) 见临渊《给世界文库的编者们》(《客观》1935年第一卷第8期)、勃生《从“文学遗产”到“世界文库”》(《杂文》1935年第2期)。

24) 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上)，第595页。

25) 论者已指出“世界文库”的中辍在于自身原因，见付伟《从《世界文库》看郑振铎出版策划的成功与失败》，《文教资料》2012年第12期。然而《晚清文选》的出版已在

1935年5月,“世界文库”由生活书店开始出版,郑振铎亲自校点所收中国古典名著,其中不乏戏曲、小说的孤本秘笈藉此重行刊印者。然而,文库发刊不久,即有批评的声音接连出现,主要系不满于其中所收“中国的旧古董”过多,“忽略了现阶段的需要”,并建议改变连载形式、以单行本作为丛书发行<sup>26)</sup>;学理上的指摘之外,翻印古书的问题还引起了更激烈的争议,甚至上升到政治层面,批评者从左翼立场“批判”郑振铎在国难时刻为“复古运动服务”、属于“不左不右”的“第三种人”<sup>27)</sup>,辞锋已经十分严厉。

在这等舆论环境下,同时尚需应对如“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等的同业竞争和销量不振的局面,郑振铎势必要作出策略上的调整。1936年7月1日,《文学》月刊发表《世界文库第二年革新计划》,声明除改刊单行本和附赠《世界文库月报》外,内容上还将增加外国部分和近代重要名著,“是最适合这时代与这时代的中国的读者的需要的”,“中国的部分,也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从表述看,此处所说的“近代重要名著”,所指即是《晚清文选》。同期刊出的“世界文库第二年目录”,“中国之部”列有《清文选(一)》,署“郑振铎编”,其说明称:

这一册清文选,选录晚清的散文,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文化史上最急骤最突变的一段;包括初期的魏源、曾国藩诸家,中期的吴汝伦、薛福成诸家,晚期的康、梁、严(复)林(纾)马(建忠)章(炳麟)诸家。这些散文,都有着极重要的历史的价值,有许多关于国难的激昂的呼声,至今仍不失为必读的名著。

---

1937年7月,时局的恶化对于“世界文库”单行本停止的影响确应存在。

26) 见勃生〈从“文学遗产”到“世界文库”〉,以及临渊〈给世界文库的编者〉等。

27) 甘奴:〈关于世界文库底翻印旧书〉,《作家》1936年第一卷第1期。

“世界文库”的最初设想中，“中国之部”的“散文”类本有各朝散文选，该类别即以“清文选”收束，还曾引起论者訾议。<sup>28)</sup>“散文选”体例的设置，即应与其时选本的盛兴、以及新文学中“散文”的流行有关。1935年中，舆论对于翻印古书的批评令郑振铎为“世界文库”思考新的题材对象；此前收入“文库”的中国文学作品偏重戏曲、小说等类，从文体的平衡而言，“散文选”实为亟需；阿英的晚清小说研究恰于此时启发了他对“晚清”的关注；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过程中对于阿英藏书的使用，也应令其对清末报刊史料有所瞩目；诸种机缘凑合之下，为“世界文库”编一部晚清文选的想法应运而生，原拟目录中的“清文选”遂首先落实为“晚清文选”。1935年10月编完《文学论争集》后不久，郑振铎即应开始了《晚清文选》的编辑工作。至次年7月1日发表《世界文库第二年革新计划》时，从声明的口吻看，《晚清文选》的完成应已有相当的把握；10月20日，郑振铎在《中流》发表《选文小记》；10月31日为《晚清文选》作序‘至全书出版则在1937年中了。

---

28) 见《世界文库第一集目录》。1936年1月1日出版的《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1期)上，邓恭三〈略论世界文库的宗旨选例及其它〉一文中云：“过去之断代或分类的诗文总集，大都已有人辑过，……文库中于此均所不取，而于各朝列一散文选，迄今所出各册中，尚未见此种文选露面，不知选者何人，并如何选法？”邓并且批评“世界文库”中国散文部分拟选作品的失当，言及“后期的梁任公诸人的文集又都没有”。邓广铭此文刊载于《国闻周报》，议论相对详实，郑振铎当应寓目。尽管对于“散文选”的批评以及应收入梁启超等文章的言论可能启发郑振铎，甚至促使郑振铎急于编辑一部散文选以落实“世界文库”的体例设计，并首先注目于近代时段，从而不排除此文乃是推动郑振铎编辑《晚清文选》的最为直接的细节诱因，但邓广铭提到的梁启超等人文集，仍属“清文选”范畴；“晚清”作为学术上的独立概念，仍应来自于阿英的影响。而邓广铭对于“世界文库”所设置的“散文选”和前代“诗文总集”的比较和疑问，正提示了前者的时代新意所在：既在于“散文”的文体观念，也在于“选”者的主观面目。

## 二、《晚清文选》：郑振铎眼中的“晚清”

1937年7月,《晚清文选》作为“世界文库”单行本之一种,由生活书店出版。该书分上、中、下三卷,选文126家(含“总理衙门”及集体作者),另阙名文章3篇,共480篇。所选文章大体按作者时序编排,以人叙次,起自林则徐,迄陈天华,涵盖了自鸦片战争以至清末革命的历史时期。作为民国间首部以“晚清”命名的断代文章总集,《晚清文选》在近代文学文献和研究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以下试从数方面讨论之,藉以见出1930年代中期、郑振铎对于晚清文学以及“晚清”时代的认识和把握。

其一,晚清文学文献的重视。1930年代距离晚清相去不过数十年,然而编辑一部文选从文献上并非易事。郑振铎言,困难之一在于“材料的不易得”。虽然去“古”未远,然而正因如此,晚清史料尚未引起专门的注意——“他们都不曾注意这个最有关系的时代”,因而甚为难觅:“在各个图书馆里,这一类的材料简直不大有”。另一则又在于“材料的过多过杂”。近代中国出版业升级,各类文献浩如烟海,“选择起来觉得非常的困难”。正因为是一项开辟性的工作,“无所依傍”<sup>29)</sup>,所有材料均需以个人之力从头搜罗。在序言中,郑振铎引用了《文选·序》“椎轮为大辂之始”一语,虽系谦辞,却一面呼应了其时作为传统典籍之代表的《文选》正引起热议、选本风气盛行的时代消息,一面也暗示着郑振铎对于自家此部文选实则寄托甚高,用意甚深。

从文献来源看,据郑振铎自述,其资料所得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阿英收藏的晚清报刊等史料。如前文所引,郑振铎说:“阿英先生收藏晚清的作品最多。很难得的《民报》全份、《国闻报汇编》、《黄帝魂》等等,都是从他家里搬来的。”《晚清文选》书末所收三篇阙名文章,即出自

---

29) 以上引文见《晚清文选·序》。

《黄帝魂》一书。而在资料来源上倚重报刊，正是清末文献与前代相比的最重要差别。阿英和郑振铎的晚清研究从起始处即把握到了这一特征。

二是已有的近代文章总集。郑振铎云：

几种清末的《续经世文编》、《经世文新编》以及《蓄艾文编》之类，当然给我的帮助不少。可是多偏于一方面，未能见其全。同时，往往不注出处，有时无从知道其来源。（《晚清文选·序》）

晚清经世类文章集所出甚夥；此处提及的几种清末“文编”，或指葛士澐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1888)<sup>30</sup>、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1898)和于宝轩辑《皇朝蓄艾文编》(1903)。诸《文编》均以“经世”为旨归，且出自时人之手。以《皇朝蓄艾文编》为例，是书“以济时为务”(见该书《例言》)，专收清季新政新学文献，虽未以“经世”为名，然而宗旨实与之同；从目录看，《晚清文选》与其作者重合者29家，选文相同者26篇，确为参照之一，然而比例亦非甚高。一方面，前朝《经世文编》所收篇目多涉及具体实务，《晚清文选》已无需虑及于此，所收偏于总论性文章，且亦注重于文化和文学素质；另一方面，《皇朝蓄艾文编》中收录相当数量的外人作品，《晚清文选》悉予删落，暗中显示了国家意识的自觉和强化。

三是郑振铎自行搜集的清末文集等资料。郑振铎本来即富于藏书的兴趣，此前主要注目于古典文献和俗文学资料等的搜罗，此时出于编辑《晚清文选》的需要，开始关注清末文集和报刊史料，“不知有多少个黄昏曾为了它而耗费在几家旧书之肆的摊头！”“就连旧书肆，对于这一类的

30) 清季曾出现数种《经世文续编》，以葛士澐所辑者“影响最广”，且选文亦自鸦片战争起始，参见《中国通史》(第二版)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龚书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较近代的作品，也很不注意；往往数日的搜访，所得不过三两部书而已。”（《晚清文选·序》）郑振铎的感慨，从侧面印证了晚清文献此时在文化市场上的确尚未引起注意，而其与阿英的工作实乃开辟之功。

《晚清文选》的重要贡献之一正是在晚清文学文献方面。阿英收藏晚清报刊甚富，而其史料编纂此前重点在新文学，出版过《中国新文坛秘录》（1933）、《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1934）等资料集。1935-1936年间，阿英相继发表《清末文艺杂志》、《清末小说杂志略》等文，开始了清末文学文献的目录学工作；《晚清文选》亦正编纂于此时。郑振铎将编辑新文学选本的目光转向晚清，与阿英同时开启了对于晚清文学文献的自觉纂集。《晚清文选》在序言中呼吁学界对于晚清文献和文学的关注：

“椎轮为大辂之始”，苟能因此引起大家对于这一时代的文献和文学的注意，则更完备的工作，“成功正不必自我”。……我希望有两三个图书馆对于这一类的有重要性的书籍能够尽量的搜罗、收藏，不要以其“不古”而弃之。

郑振铎并曾拟将他编纂《晚清文选》所用的参考书目刊布于《世界文库月报》<sup>31)</sup>，显示了关于晚清文献学的高度自觉意识。1930年代中期，新文学运动史的研究和史料整理正成为学界热点；《晚清文选》和阿英相关杂志目录的编纂，应亦受其启发，进而在当时古典文学和新文学的文献出版风潮中，开辟了一片新土。

这一晚清文学文献学的事业，在20世纪中续有嗣响。从史料上给予郑振铎重要帮助的阿英，自《晚清小说史》后，其晚清研究的主要方式转向文献纂集，为后来的近代文学学科奠定了文献学基础。楼适夷言：“西谛编

---

31) 中国国家图书馆今藏有1936-1937年间的数期《世界文库月报》。刊有郑振铎此份书目的该《月报》，笔者尚未得睹。陈福康先生谓“此事后未见办成”（《郑振铎论》修订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33页注释①）。

《晚清文选》，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都是有功的事业。”<sup>32)</sup> 由于时代的原因，阿英《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和《晚清文学丛钞》的集中问世已在五六十年代之交。至1980年代末启动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虽然从体式上直接参照的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然而《晚清文选》和《晚清文学丛钞》均是《大系》编纂者公认的晚清文学文献的开山之作。

其二，现实关怀和多重主题。《晚清文选》诞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1930年代中期，正值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与晚清有着十分相似的时代背景。阿英注目晚清文学，最初关注的是其“反帝国主义”内容；郑振铎亦反复强调《晚清文选》在“除了作为‘文选’读之外”的“特别的作用”(《晚清文选·序》)：

对于老维新党的奋发有为，冒万难而不避，犯大不讳而不移的勇气，与乎老革命党的慷慨激昂，视死如生，掷头颅，喷热血以求得民族自由与解放的精神，我同样的佩服。对于魏源，马建忠，林纾，严复，梁启超们所做的介绍与启蒙的工作，我也同样的表示敬意。

前文曾论及《晚清文选》的诞生，亦是出于当时舆论对于“世界文库”选刊古典著作过多、脱离现实情境的批评。实际上，郑振铎自“五四”、“五卅”以来一直关心时局、奔走呼号；此前在丛书中刊印孤本秘笈，乃是出自自身浓厚的学术趣味，为传播文化计，今日看来亦无可厚非；《晚清文选》的确从题材和主题上回应了有关“世界文库”的舆论，然而郑振铎对于“启蒙”和“革命”的“敬意”，对于“求得民族自由与解放”的晚清时代精神的特意抉发，确是有感而兴，在对晚清的阅读中真切感受到了精神上的契合处。

32)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争鸣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页。



从所收篇目看,《晚清文选》最重要的特点正在于它的经世取向和现实关怀。在〈选文小记〉中,郑振铎说:“这一册里有许多文章,对于我们这一个时代,还是对症之药,并非泛泛的搜集名篇佳文的一部‘文选’而已。”由于“特别”关注“有关于革新运动及思想变迁的”“重要文章”<sup>33)</sup>,书中有关时政的内容占据了至少半壁江山,涉及中外交涉和改革、新政的主题尤为醒目。入选文章在十篇以上的作者,有林纾、王先谦、严复、龚鞅祚(自珍)、薛福成、章绛(太炎)、冯桂芬、曾国藩、谭嗣同、郑观应、王韬、吴汝纶、唐才常诸人,与日后近代文学史的判断大体相合,亦可见出选者对“老维新党”和“老革命党”的重视。其于康有为、梁启超各选入4篇、9篇,数量上不及当时殉难之谭嗣同、唐才常,或暗示了郑振铎意识中对于“革命”的更为亲近。文章数排前三位者,分别为林纾(32篇)、王先谦(28篇)、严复(23篇),则显示了郑振铎并非纯然以政治立场为取舍标准,重“新”而亦未弃“旧”。而如胡林翼、沈葆楨、刘铭传、刘永福、袁世凯等非以文名之诸人,以至“总理衙门”的收入,则可见出郑振铎的选法乃是以文取人,而非因人录文。

在此类文章的选择标准上,《晚清文选》主要是文以从“事”。此处所谓之“事”,涵盖了时局、军事、财政、教育等诸方面内容,而尤其显出对于重要历史关节的注意。如关于太平天国,收入了杨秀清、洪秀全、石达开以至钱江、黄畹等多人文章,不仅显示了对此段史事的重视,且虑及各方立场,与所收曾国藩、江忠源诸文可相对读。而诸如李钟珏〈禁猪仔议〉、张树声〈戒粤民出洋谋生示〉等文的收录,亦显示了存一时之史的意识。

时政之外,《晚清文选》的另一重要主题是学术。传统学术领域如方东树、廖平、孙诒让等均有收录。诚然,更重要者在于新学。在西学的理

---

33) 以上引文见〈选文小记〉,《郑振铎全集》第二卷,第555、554页。

论倡导方面，郑振铎特地选入了杨选书[青]〈宜习西文说〉和岳父高凤谦的〈繙译泰西有用书籍议〉等文；新学人物如马建忠、黄遵宪等均予收入，甚至涉及自然科学领域者如华蘅芳亦在其列。俞正燮〈贞女说〉、〈节妇说〉的采录，显示了对于道德领域新观念的重视。而于同一位作者，郑振铎亦能兼顾其不同面向：如章太炎的学术之文与其政论、林纾的古文和译序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晚清文选》还选入了包括〈红楼梦评论〉以及词、曲研究在内的王国维的数篇文章，在诸家文章中别具一格，显然是出自选者自家的学术眼光，而遂采入民国新学术之先声。

作为“文选”，《晚清文选》也蕴涵着充分的文学素质。书中选文最多的作者林纾，从所收目录看，即主要以古文家的身份录入。素以古文名的梅曾亮、吴敏树、张裕钊等亦均选入。所涉文体如人物传状、书信、赠序等，尤为瞩目者当属诸篇游记。1930年代中期，正值晚明小品作为纯文学散文的前身兴盛一时之际；沈启无所编《近代散文抄》，“所收文章最多的是游记”<sup>34)</sup>。《晚清文选》所采录短篇游记散文，情致颇类晚明小品，应亦不乏当时新文学思潮的影响。此类作品的选入，显示了《晚清文选》接续的古文传统以及对于新文学“散文”的呼应，既体现了郑振铎的文学兴趣，也印证着《晚清文选》的丰富性和作为散文选本的文学史位置。

其三，“散文”的大文学观。除在纸面上用新式标点替代传统句读之外，在体例上，《晚清文选》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无门类之分。之所以如此，内因应在于白话文已然盛行的1930年代，传统文体界限在“古文”的大名目下已可模糊，并无辨体之需，实学门类亦大多失去现实意义，因而可以广搜博采，冶于一炉。在“世界文库”的拟目中，《清文选》乃

34) 黄开发：〈重印《近代散文抄》序〉，《近代散文抄》，沈启无编、黄开发校，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3页。

属于“散文”一类。作为新文学文体概念的“散文”，此时正在形成之中。《中国新文学大系》设置“散文一集”和“散文二集”，正式确立了“散文”作为新文学的重要文体的地位；二书分别由周作人和郁达夫编纂。在“导言”中，郁达夫首先为“散文”概念作较详尽的理论上的探讨，周作人则明确将新文学的散文定义为自文学革命起的白话美文。其“不讲历史，不管主义党派”<sup>35)</sup>而编定的《散文一集》，的确主要贯穿了白话美文的“散文”观。

作为“世界文库”设置的“散文”类的实践成绩，《晚清文选》承载着编选者的“散文”观念。郑振铎借用新文学的流行概念，实际接近的是与韵文相对的“散文”观，而更有新的拓展。在《晚清文选》中，既多疏、奏等应用之文，亦富于书、序等古文体式，也不乏可供赏心悦目的小品美文，甚至收录札记(如王国维《文学小言》)、章程(如容闳《请创办银行章程》)，以及林纾所译短篇小说《李迫大梦》！清末出现的文章总集，实则因应时势，已然是兼收并蓄；如《皇朝蓄艾文编》，既收录大量外人作品，也纳入各部奏疏、阙名文章，以至法则、告示等，作为参照之一，在体例上对于郑振铎应不无启发。收编了“古文”的“散文”概念，既沾溉于新文学的活力和生机，又可突破传统文章学的藩篱，将经世文字一并纳入，以至新体学术论文、翻译小说，概予笑纳。此固然是新旧文学过渡之际、界限未明留下的空间所致，然而仍是出自郑振铎的胸怀广阔、别具手眼。

清季以降的文章总集编纂，大致存在着三种路数，即：以经世为旨归、实学为内容的“经世文编”系统，属桐城流脉、讲求文章之学的“古文辞类纂”系统，以及旨在存一代文献、具有史料性质的“文汇”系统<sup>36)</sup>。

35)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第12页。

36) 1910年，王文濡等辑《国朝文汇》由上海国学扶轮社石印出版。全书历时三载，共

郑振铎自陈其曾受惠于数种《经世文编》，尽管批评其“多偏于一方面，未能见其全”，然而在“经世”宗旨上仍息息相通；《晚清文选》中收录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而郑振铎早年对《古文辞类纂》曾有所批评；实际上，其在清文总集中颇为重视的尚有《国朝文汇》。不仅郑振铎藉观“政教”与“学术”的选文趣味与黄人接近(见《国朝文汇·序》)，《国朝文汇》广搜博取的特点，更使其具备史料资格，可成为后来选家的参照和材源。对照《晚清文选》与《国朝文汇》的目录可知，郑振铎在选文过程中应参考了后者，并以之为重要材料来源之一。<sup>37)</sup>由“汇”到“选”之间，差别正在于选家主体面目的凸显。

作为1930年代产生的前代文章选本，《晚清文选》并非意在为读者提供古文范本和文章教科书，亦非旨在作为治世实务的具体参考。它秉

---

200卷，篇幅宏富；自道光以迄光绪朝占50卷，作者298家。是书明确批评《古文辞类纂》“拘于宗派”(《清文汇·例言》，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本文中仍用“国朝文汇”旧称)；欲以“文”代替“古文”概念，“保存国粹”(见该书沈粹芬〈序〉)；“以备一代之典要而观其会通”(汤寿潜〈序〉)，并藉以观有清一代之“政教风尚”与“学术思想”(黄人〈序〉)。

- 37) 最典型的例证如《晚清文选》收“龚巩祚”文20篇，均在《国朝文汇·丙集》卷七“龚巩祚”名下24篇的范围内，所列顺序亦与之相同；类似情形在郑珍、华蘅芳等作者处亦可见到。诚然，此种情形并非常态，郑振铎对于入选作者和文章均有全盘遴选与增删。《晚清文选》截断众流，以林则徐、魏源起首，显示了鲜明的面目和旨趣。在同一作者名下，二书所选文章也多不同，如《晚清文选》收曾国藩文12篇，《国朝文汇·丙集》卷十五收其文28篇，其中重合者6篇，如〈讨粤匪檄〉、〈轮船工竣并陈机器局情形疏〉、〈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书〉诸文，均为郑振铎所增选者，从主题上可以见出选家明确的选文取向；类似差别在冯桂芬、魏源、郭嵩焘、王韬、薛福成等作者处均可见到。《国朝文汇》虽有超越《古文辞类纂》的“宗派”意识和“古文”观念的理论主张，亦有涉及新学文章的收录，但整体上选者基本未突破传统古文范畴，所录“多传、记、书、序、弔、祭等文”，奏议等仅“登载一二，聊备体格”，“过于违碍者”亦不予收录(《国朝文汇·例言》)，选文实践与序言中的表彰尚存在一定距离。《晚清文选》则更多选入与时代现实、新学/改革有关的论议类文字；如《国朝文汇》中仅“聊备体格”的奏议，在《晚清文选》中恰占有重要位置；后者亦无需有政治因素的考量和规避。因之，真正旗帜鲜明地体现晚清“政教风尚”和“学术思想”的，还当属二十余年后诞生的《晚清文选》。

承了《经世文编》的气质，也自然维系着古人流脉的承传，同时也汲取了新文学的趣味，而又各有取舍。它的命意更在于通过面目鲜明的整体性选择，以一部文选而见出一代之文章，进而见出一代之史。从而，《晚清文选》的重心在于“文选”，更在于“晚清”。其所承载的文学观念，乃是一种因文存史、文史互见的大文学观，以及情感层面蕴蓄的经世取向和现实情怀。其中固然吸纳了新文学的思想观念，而更流淌的是本土传统的血脉，与周作人倡导的纯文学的美文观恰成对照。1920-30年代，周作人、沈启无等标举晚明文学作为新文学的远源，亦是在阐扬本土传统；而郑振铎对晚清文章的发掘，和阿英对晚清小说研究的推动一道，与周作人等提倡、其时正蔚成风气的晚明小品散文的流行相互映照，秉持着忧患与隐逸的不同精神气质以应对时代现实，形成二水分流的态势，昭示着可供开掘的传统资源的丰富与复杂。

诚然，当稍后晚清/近代文学研究进入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学科建设内在地召唤更为明确的“文学”概念时，《晚清文选》的选文理念也无形中受到了挑战。阿英编选“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时，仍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至《晚清文学丛钞》，则已主要以文体分卷，其设想中原有“散文与杂文卷”，虽未曾实现，然而“散文与杂文”的定名，显示了对于文体划分的省觉和反思。至1980年代筹备《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诸位编选者在以《晚清文选》为参照之一种时，也提出了此方面的疑虑：“《晚清文选》里面可称为文学作品的，也并不多”<sup>38</sup>。《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卷帙扩增，从选目上可以见出对于《晚清文选》的参考，然而的确更为注重作品的文学性。后来者以学科化的“文学”概念范围晚清文章，昭显了晚清文学研究的专业化和精细化趋势。而反观《晚清文选》，或许正因诞生于晚清研究初期，得以有肆意发挥的空间，反而

---

38) 见伍彝甫致范泉信，《〈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争鸣录》，第26页。

别具一种“元气淋漓之象”。超越于狭义的文体范畴之上，由一部文选以窥见一个时代，此应是郑振铎作为选家的初衷，亦正与晚清作为重要历史关节的时代禀赋相契合。

其四，定义“晚清”。《晚清文选》所指向的“晚清”，在时间范畴上始于鸦片战争，迄于辛亥革命。郑振铎以鸦片战争作为“晚清”的开端，其深层理据在于以中外交涉、尤其是1930年代背景中的帝国主义话语和国难叙事的思路来追溯近代历史。郑振铎对于晚清的时代性质，乃定义为“转变期的中国”，从而指出此一时代乃“最有关系的时代”(《晚清文选·序》)，实把握住了晚清的根本性特征。而若加以细察，其对于晚清的认识亦经历了深化的过程，并曾有更具体的论断。

1937年3月10日，第4-5期《世界文库月报》刊载新书预告云：

这一册清文选，选录晚清的散文，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时间虽然不过七十年，但实是中国文化史上变化得最急骤，最突然的一段；中国的近代化，可以说是从那时开始。这七十年间的散文，包括初期魏源、曾国藩诸家，中期的吴汝伦、薛福成诸家，晚期的康、梁、严(复)林(纾)马(建忠)章(炳麟)诸家。有许多文章已是被我们遗忘掉，然却有极重要的历史的价值，有许多文章，至今读之，仍有意思；我们的社会还有一部分不曾脱离这初期的改革时代的形态。这七十年间经过了许多次严重的国难，那些对于国难的激昂的呼号，也是足以使我们处在这更苦难的时代的读者为之感兴的。

此段文字作为对于《晚清文选》的推介，应出自郑振铎的手笔。与前引1936年7月1日《文学》上所刊载者相比，半年后的此则介绍在段落结构和部分表达上基本一致，应系参照前者修改而来；而从变化之处(引文中用粗体标出)则可见出，应是随着选文工作和相关思考的推进，郑振铎对于晚清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此一段文字中，除说明“晚清”的时

间范畴外，郑振铎对于“晚清”的时代性质还表达了三个重要判断：

首先，晚清七十年是“中国文化史上变化得最急骤、最突然的一段”，是“初期的改革时代”，“中国的近代化，可以说是从那时开始”。变革、改革和近代化——郑振铎对晚清的准确把握显示了他作为学者的历史眼光。这其中，后二者为半载之前《文学》上的介绍所无，尤其如“近代化”这样的专门概念，应有着较直接的思想资源。1936年11月1日，《独立评论》曾刊出蒋廷黻〈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一文，系为纪念民国成立二十五年而撰写，在此前后亦发表于《大公报》和其他数种杂志。蒋廷黻从世界范围内将近代化的事业与国运相联系，同时将“中国近代化的发起人”指称为“同治年间的权贵”，提出中国的近代化是从同治间起步、自上而下地推行。<sup>39)</sup>有关“现代化”的讨论曾在1930年代初热烈展开，“近代化”一词亦有使用，然而频次远不及前者。《独立评论》首页的寄售处中，上海一地首列“生活书店”；以该刊在舆论界的位置及郑振铎和胡适的关联，郑振铎应曾寓目蒋廷黻此文，“近代化”的概念和思考或即受此启发。与之相较，郑振铎将中国近代化的起点上溯至鸦片战争，前推了二十年；而郑振铎热切表彰各类型的知识人“对于国难的激昂的呼号”，与史学背景的蒋廷黻注目于政治格局的思路亦可相补充。

其次，郑振铎对于晚清七十年有初期、中期、晚期之分。从所举人物推测，郑振铎所谓初、中、晚三期，大体上应分别指称鸦片战争至同治间约三十年、光绪前期二十年、以及自甲午以后至宣统约二十年——可知郑振铎眼中的“晚清”存在着阶段性的变化，且历史的强度亦在与时俱增。今日看来，郑振铎对于鸦片战争、同光之交、甲午与辛亥数个时间节点的把握均相当准确。《晚清文选》上、中、下三卷之分，即应与初、中、晚三期对应。而三期的划分，实则意味着“晚清”作为特定

---

39) 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化的问题》，载《独立评论》第225期。蒋在文末亦提到“国难”。

的时代概念, 已具有相对独立的历史性质, 此亦是郑振铎未曾言明的理论贡献。

最后, 郑振铎一直将晚清与1930年代的中国相比较和关联: 一方面, “晚清”并未远离, 当下的中国社会“还有一部分不曾脱离这初期的改革时代的形态”; 另一方面, 晚清同样是“国难”的时代, 而当下则更为“苦难”。对“国难”的把握, 实是“晚清”之成立的根本要素——以现代性的国家交往为导向的中外交涉, 以及艰辛孕育的独立自存的民族国家, 是十九至二十世纪之间的中国持续面对的主题和追求。“晚清”之于1930年代, 乃是时代之学术。

1944年, 郑振铎撰〈清代文集目录序〉其中回顾了自己藏书兴趣的数度变迁, 而竟有以清季为依归的倾向:

予收书始于词曲小说及书目; 继而致力于版画, 遂广罗凡有插图之书; 最后乃动博取清代文集之念。自壬午至甲申, 予几无日不阅市。每见清人集, 必挟之以归。……此三年间, 则无所不取, 而尤着意于嘉、道二朝所谓朴学家之文集。……晚清诸家集, 亦足以考见近百年来之世变, 往往为予《晚清文选》所未收。续选有日, 必将据此成编。<sup>40)</sup>

在与阿英的交往中关注了“晚清”, 又因时代风习和“世界文库”的机缘兴起“文选”的念头, 郑振铎《晚清文选》的编纂诞生于193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界的思潮交织之中, 亦是其深厚的文献兴趣与时代现实的内在呼应。对晚清的关注进而影响了郑振铎本人的学术研究。所谓“续选有日”, 郑振铎对于晚清的兴趣亦深而且久。惜乎郑振铎早逝, 否则, 他与阿英之间的晚清研究因缘, 当应还有更长久的展开。尽管至于今日, 作为

40) 《郑振铎全集》第六卷, 第940-941页。



研究方式的“文选”以至于“文学史”在专业化的冲击之下已显得黯然失色，与“国难”相联系的“晚清”也常为另面的现代性所遮蔽，然而，置回于时代现场和文本脉络之中的《晚清文选》，仍显出丰富的蕴涵，并为今日的晚清文学研究继续提供着省思的可能和参照。

▣ 参考文献

- 《郑振铎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
- 《阿英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 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 沈启无编，《近代散文抄》，黄开发校，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
- 王文濡等辑，《清文汇》，北京出版社，1996年。
- 阮无名编，《中国新文坛秘录》，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
- 钱谦吾编，《转变中的鲁迅》，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1年。
- 阿英编，《现代十六家小品》，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本，1990年。
- 李伯元著，《庚子国变弹词》，阿英校，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 周作人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 王延晞、王利编，《郑伯奇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
- 范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争鸣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
- 《文学》，1935年第五卷第5期。
- 《新小说》1935年第二卷第1期。
- 《生存月刊》1933年第四卷第6、7期。
- 《太白》1935年第二卷第5期。
- 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年。
- \_\_\_\_\_.《郑振铎论》(修订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年。
- 黄开发，〈一个晚明小品选本与一次文学思潮〉，《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 付伟，〈从《世界文库》看郑振铎出版策划的成功与失败〉，《文教资料》2012年第12期。

〈Abstract〉

*Wan Qing Wen Xuan* and  
Zheng Zhenduo's View on the Late Qing

Guo, Daoping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compilation of *Wan Qing Wen Xuan* in the mid-1930s, and tries to indicate the main points of Zheng Zhenduo's view on the Late Qing period. Zheng's motive to edit such an anthology is incited by contemporary literary trends, while also inspired by AYing, who was just focusing on the study of Late Qing. Zheng shows a specific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Late Qing literature, which makes him one of the pioneers in that study area. His opinion on the time category of Late Qing as a historical concept, as well as his statement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at period, can still be illuminating today.

Key Words : *Wan Qing Wen Xuan*, Zheng Zhenduo, AYing, Late Qing, *the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이 논문은 2019년 10월 31일에 접수되어 11월 30일에 심사를 완료하고  
12월 10일에 게재 확정되었습니다.